

播火者李大钊

□ 张树军

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历史性贡献：一是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二是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骨干人才；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索中国实际问题，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李大钊在青年时代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1913—1916年间，李大钊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开始阅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传播较早，1904—1905年《共产党宣言》日译本开始出版。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已经将马克思的《资

本论》翻译成日文，这使李大钊能够接触到马克思原著、学习马克思主义。

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李大钊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等文章，在介绍俄国革命的同时，称俄国革命是“和平之曙光”，代表“国外政治之潮流”。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开始深刻认识它的价值和意义。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号上发表《新纪元》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从1919年初开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逐渐加深。他在当年2月发表的《战后之妇人问题》虽然谈的是妇女问题，但是已经明确表达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思想，他认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一方面是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表达了李大钊运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剥削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在深入学习之后，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救星”，并成为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中国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李大钊更以极高热情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播撒真理“火种”。他将自己负责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协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一系列介绍马克思生平、学说和贡献的文章。

1919年夏，李大钊写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后分两部分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第6号上。他在这篇长文中用相当一部分篇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摘译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相关段落，并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领”归结为两点：一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

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二是“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否则，就会出现“社会革命”，以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组织，但这样的革命不会轻易发生，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的时候，才会发生。

1920年7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和史学系教授。从当年10月份起，李大钊即为政治学系学生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此后只要在校时便每年为史学、政治两系学生讲授。通过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以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兼课和在武汉、上海、成都等地高校的讲学活动，李大钊从大学学术建制层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熟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等专门人才，其中接受过李大钊授课的部分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骨干成员，如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黄日葵、王复生、罗章龙、范鸿劼、何孟雄、缪伯英等。上述讲义中的文章，后来大都公开发表在报刊上，从而越出校园，发生全国性影响。

李大钊还领导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多个社会团体，推动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活动。正是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下，一大批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探索者

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仅停留在理论探讨，即一般学术和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上，而是更进一步，将之运用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上，用于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

李大钊指出，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不仅丧失了政治独立，而且也丧失了海关、铁路、通商口岸等的掌控权，经济权力“都归了人家的掌握”。相较而言，西方国家的人民只受其本国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而中国则要受多个列强的共同宰制，中国经济的变动也是由于外力压迫而产生的，因此“中国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牺牲更大”。中华民族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受全世界资产阶级压迫、所受痛苦所做牺牲远超各国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就必须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迅速发展中国实业，摆脱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1921年3月20日，李大钊在《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上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阐明了中国只有用社会主义方式才能发展实业的看法。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组织，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劳资矛盾突出，劳工运动日盛一日，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制度受到怀疑和批判，世界已经开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同时，西方国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至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如果中国还按部就班地按西方曾经走过的老路亦步亦趋地重走一遍，那么，“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发达国家？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贫穷落后乃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局面？中华民族要存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逐步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诸多仁人志士为反抗侵略、挽救危亡、复兴民族，试图从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他们先后从西方理论宝库中找到18、19世纪的一些理论和学说，但是却迟迟没有发现1848年就已经正式在欧洲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正因为如此，从1840年至五四运动前夕，在差不多80年的长时期里，尽管他们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却由于没有科学理论做指导，所有这些挽救危亡的努力和奋斗，最终都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手绞杀而失败。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李大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探究近代中国国运变动的原因，得出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发现“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缚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二是发现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除了用革命手段废除中外间的不平等条约以恢复中国在国际上的“自由平等之位置”外，还必须采用社会主义。这使得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命运及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了科学认识，知道无论面前多么艰难险阻，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复兴的伟大事业必将成功！正是由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并用其解释和指导中国历史进程，“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摘自2019年10月3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毛泽东谈
干部人才培养

□ 张文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胡来，让毛泽东担忧将来中国也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的危害之中。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1964年2月，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时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4月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参加义务劳动，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将义务劳动和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为什么在十三陵讲这个话？十三陵有明朝的故事。明朝灭亡与宋朝灭亡，乃至苏联的解体都有相似之处，这就是它的学风严重脱离实际。毛泽东在十三陵讲话主要是讲干部人才培养，培养方式特别强调“大风大浪”。

（摘自2019年12月23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我们赢在哪里？赢在人才！》）

晓天下

路秀峰：
勇敢搏斗精神长存

□ 尹思源 李 鲲

路秀峰，1948年出生，1977年参加公安工作，生前为天津铁路公安处天津站派出所民警。1980年8月壮烈牺牲。1980年8月，路秀峰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9月被追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1980年8月初，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巴彥淖尔临河县（今临河区）的男子梁大东、王新国、白永胜，盗窃了临河县武装部大批枪支弹药。随后，他们计划乘车去东北，密谋干几起“惊天动地的大案”，中途在天津火车站转车。8月16日晚，3人在车站广场逗留时，由于形迹可疑被天津站派出所执勤民警马幼航带至派出所值班室，由值班民警路秀峰、路明做进一步审查。

在对犯罪嫌疑人王新国进行询问时，路秀峰准备对他进行例行检查。王新国猛然蹿起，撩开上衣前襟，伸手去摸别在腰间的两支五四式手枪。路秀峰猛扑上去扭住其胳膊夺下手枪。路明猛地抬头，发现梁大东正隔着屋门的玻璃举枪瞄准民警。路明来不及多想，向正在弯腰捡枪的路秀峰大喊：“注意后面！”话音未落，梁大东已经踹开房门，朝民警疯狂开枪。路秀峰迅速转身，冒着被子弹击中的危险，向嫌疑人梁大东扑了上去，死死地抓住梁大东的小臂，迫使其双手高举，难以平射。梁大东斜下枪口，再次扣动扳机，子弹击中了路秀峰的后脑。路秀峰忍住剧痛，再次顽强地用身体撞向梁大东，拼尽全身最后的力气将嫌疑人逼退。然而，梁大东再次开枪，路秀峰胸口中枪，壮烈牺牲。

凶犯梁大东在仓皇逃窜中被随后赶到的刘五兴等民警当场击毙，王新国、白永胜被捕，3名犯罪嫌疑人所带的17支手枪和剩余子弹全部被缴获。然而路秀峰却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和亲爱的战友们。

（摘自2019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

严以修身
——不搞特殊化

父亲要求我们子女要严以修身，夹着尾巴做人，不准搞特殊化，做个普通劳动者，自己去经风雨见世面。父亲从来不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子女谋福利，我们姊妹没有一个做大官、发大财的，都在平凡岗位上作贡献。

我上幼儿园时，假期在家里吃饭，吃饱后碗里还剩了口饭菜，父亲让我吃完，我不肯，他就与我一起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讲农民种粮食不容易的道理。可我眼泪汪汪的，任凭父亲好说歹说就是不肯吃。父亲后来火了，拍着桌子逼我吃，我磨蹭了半天，拗不过父亲，最后不得不吃光了碗里的饭菜。从此我养成了饭菜一定吃干净的习惯。

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后来在部队农场接受了两年再教育。1970年，组织分配我到学校当教师，2000年退休。和我一同学习、工作的人大都不知道我是宋时轮的儿女。我们从来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没有依靠父母的关系，为自己谋个好出路。我们没有继承父亲任何物质财富，却得到了父亲珍贵的精神遗产。

（摘自2018年第10期《党建》，原标题为《说说我父亲的“三严”——一个老将军留给女儿的回忆》）

往事

我的父亲宋时轮将军原名宋际尧，1907年9月10日生于湖南醴陵北乡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父亲一生历经坎坷，却始终对党忠心耿耿，无限热爱。无论是打仗、搞军事科学研究，还是对子女的教育，父亲都是以严著称，处处体现出“严守初心、从严治军、严以修身”的“三严”作风，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严守初心——三次入党

父亲传奇的一生动人心魄，三次入党的经历扣人心弦。1921年，父亲进入醴陵县立中学读书，与左权是同学。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们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抨击时弊，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1926年4月13日，父亲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后经复试顺利成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入校后，父亲的各项科目成绩都比较好。就在他满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学员时，不幸染上了疟疾，只好在广州东山医院住了半年多医院。其间，父亲经张一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后，因缺课太多，黄埔军校将父亲转入第六期学习。1927年1月，父亲由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张庆孚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父亲刚入党没多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父亲在广州被捕入狱，关了两年。直到1929年4月，经共产党员梁益通找保人担保，父亲被释放。出狱后，父亲从广州转移到香港，等待接转组织关系。这期间，父亲在住处附近巧遇老同学李适生，李适生硬要拉他去广西张发奎的部队工作，两人因意见相左发生了争执，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父亲担心节外生枝，没等在香港接转好组织关系，就于当晚匆忙搭船去了上海。由于人生地疏，虽经多方努力，父亲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眼看钱要花完了，无奈之下只好辗转回到家乡醴陵。

回到家乡后，父亲白天上山躲避敌人搜捕，晚上下山宣传、发动群众。他想，就算一时找不到党组织，也要拉起队伍闹革命。他对家里人表明立场：“我要继续干革命，跟地主、军阀势不两立。”这期间，父亲化名“张司令”，带领这支被当地人称为“黑杀队”的组织，在醴陵、浏阳、攸县和江西萍乡一带打游击。

1930年初，父亲旧病发作，来到已成立苏区政权的江西省莲花县医治。因为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父亲在养病中，经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他领导的萍醴游击队编入红六军。

1934年初春，父亲到红军大学学习。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红军大学组织学员在星期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父亲因为有旧伤，挑不了太重的东西，挑泥时，父亲对负责上泥的学员说：“以后能否少装些呢？”可没想到，他挑下一担的时候，装得更重。父亲的火爆脾气是有名的，他说：“我是自愿来帮助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帮做苦工的，你为什么要做到这样？”回到红军大学，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说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学校便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等原因，给予父亲开除党籍3个月的处分。说是3个月，但随后红军就开始长征了，父亲的党籍问题也被搁置。一直到了陕北，当毛泽东委派我父亲去红十五军团担任作战科长时，父亲才含着委屈说：“作战科是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非党员干部去，合适不？”毛泽东问：“怎么回事？”父亲如实陈述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接着说：“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请你服从组织的安排，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毛泽东谈话后，被排斥在党组织外一年之久的父亲，由十五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第三次入党。

我父亲的“三严”

□ 宋崇实（宋时轮三女儿）

从严治军——带出过硬队伍

父亲一贯坚持从严治军的原则，他带部队突出一个“严”字，严格管理，严格要求。1947年2月，由渤海地方武装升级而成的华野第十纵队成立，父亲任司令员。对这支部队的建设，他花费了大量心血。纵队建立伊始，他就狠抓部队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培养，结合实际开展严格教育，拟定规章，严格管理。他要求各级干部和队伍在严酷的战争中经受考验，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培养英勇、顽强的作风。他建立教导队、训练队，对骨干进行短期培训，亲自讲课，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使部队迅速掌握克敌制胜的本领。在父亲的带领下，十纵在解放战争中由小变大，由弱转强，成长为一支能打大仗、硬仗和恶仗的队伍。

在国民党军队精锐云集的华东战场上，父亲率领十纵屡战强敌，特别是在几次事关全局的战斗中，十纵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浴血拼杀、所向披靡，以至于在国民党军中流传有“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说法。1948年，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区寿年兵团被我军团团围住，父亲奉命率领华野十纵，在桃林岗阻击前来救援的邱清泉兵团。蒋介石和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乘飞机亲

临上空督战。邱清泉使出浑身解数，下了“进攻不成，按级斩首”的死命令，飞机、大炮、坦克、毒气全都使用上了，多次组织部队反复进行集团冲击，想杀开一条血路。父亲要求部队“寸土不让，顽强死打，适时组织反击”。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5昼夜的血战，桃林岗阵地始终坚如磐石，敌人无法前进，眼睁睁看着20里外的区寿年兵团被我军全歼。

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亲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在上海战役前，父亲就带领参谋看地图查资料进行精确计算，将上海划分为五个警备区域，设置5000多处岗哨，任务下达给各军，因此上海一解放，就迅速展开警卫。部队进驻上海期间，严格遵守纪律。全军看管16处仓库，库房内各种物资堆积如山，官兵愣是没动过一块银圆。解放军遵纪爱民，成为闻名于世的正义、文明之师。

父亲从朝鲜战场回国，在和平年月仍然从早忙到晚。父亲任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时，我经常看见，夜深了父亲办公室里的灯光还亮着；清晨我醒来，父亲早已不见了踪影，原来他一大早就去部队检查操和内务情况去了。由于过度劳累，父亲的头发过早地全白了。我曾对父亲说：“有人反映你要求太严了，大家都怕你。”父亲告诉我：“只有严格要求，才能带出过硬的队伍，才能打硬仗！”

